

忆宁波建党初期

王任叔（巴人）

一、宁波建党的经过：

一九二二年暑期，宁波开办暑假教师讲习所，聘请国内著名之士讲学，促进中小学教师教学修养。这是“五四”运动在宁波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斗争在文化方面开风气的一着。在过去，学生会、十人团，仅仅以“反日”的爱国运动的名义发动些斗争，但教育方面都还被所谓‘古文派——桐城文学’或‘鸳鸯蝴蝶派’的洋场文学所垄断。而这一教师讲习所，在那时是提倡杜威的教育学说和新文化的传播为目的。那时来讲学的有郑振铎及沈雁冰等。我在这暑假里，也偶然去那里听讲。

就在这个风气下，有一个师范旧同学，在大同大学念书、名叫宓如卓的来看我，他那时，常在商务出版的《学生杂志》（杨贤江编的）写稿，大概杨贤江那时已是共产党员。宓对我说：要在宁波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因为我在那时，已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郑振铎编）发表文章，认为我进步。他并且约谢传茂（师范同学，后叛党，解放后劳改）同我三个人谈了一谈，要我注意发展对象，但须等他回上海后，再决定要不要成立共产党小组。

同年的下半年，我去慈溪普迪学校教书。大约在九月、十月间，接宓如卓来信，说上海党方面，曾派人到宁波火车站和和丰

纱厂的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认为组织党的条件还不很成熟，前次建议作罢。

一九二三年暑期前，发生宁波第四中学“拒经”风潮。当时浙江省政府委任经亨颐（即经子渊，国民党左派）为四中校长。

“五四”运动时，经为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有学生施存统（即施复亮）宣传共产主义，震动全国。社会上有人认为经校长是共产党员，经任四中校长消息发表后，宁波遗老张让三（曾作薛福成随员，去外国办过外交，据闻秋瑾的被杀，他也以幕后身份参予其事。）写信给浙江省当局，表示反对。此事在报上登出后，没有人提出反响。

但这时，在奉化已展开新、旧两派的斗争。新派以家兄王仲偶、胡颖之、严作书和张乐尧等为中心，拥护正直的绅士庄崧甫、孙表卿，同城内一些劣绅争夺县议会的势力。前者结社曰“剡社”，后者结社曰“法治协会”。该会的中心人物以城内绅士某（忘其名）为主，此外如俞飞鹏、朱守梅、凌某（忘其名）也是该会主要人物，在奉化城，乡绅之间的斗争，自辛亥革命之时即已开展。此时，因处在大革命前夜，斗争又爆发。“法治协会”自知凌某的声望远远不及庄崧甫，乃造谣说：庄年老病故，以便夺取县议会议长一席。但事后却遭失败，庄崧甫终于就任县议会的议长。孙表卿为宁波《四明日报》的董事长，严作书、张乐尧在《四明日报》作记者。我同胡颖之（也在普迪教书）利用这个关系，乃起草一欢迎经亨颐长四中的信，并约人签字，在报上发表，驳斥了遗老张让三的议论。这大大地震动了宁波各界，打退了一些阻力。一九二三年下半年终，经亨颐来宁波当校长。但我却因此被普迪学校当局辞退。在老友王吟雪主持的佛教孤儿院

闲住，休养神经衰弱病。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我就任于奉化松林学校。此时，奉化已由县议会通过，开办初中。想继续辛亥革命，并多少散布一些新文化的思想。主其事的即为胡颖之、王仲偶、庄长兆（即世楣）。我在松林学校时，接宁波谢传茂来信，报告宁波已公开成立国民党分部，其中张葆麟为出面负责人。而国民党内部也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由谢负责。前年我们所谈的事，仍继续，希望我加入共产党，同时也参加国民党，我去信答应。但并无正式入党手续。我不愿再当小学教师，乃在奉化初中另辟一室，自己读书写作。十月间，宁波《四明日报》社由李官卿（提倡杜威教育学说，后为国家主义派）任主编，邀我去当编辑。这时谢传茂也在报馆工作，我才开始过党的组织生活，但那时组织生活非常不健全，参加的人有谢传茂、赵济猛（已死）和周天~~廖~~（已叛，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内部派人暗杀）。因为这张报纸被认为“赤化”，李官卿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一九二五年的二、三月间，我被迫撤退，失业后去上海过流浪生活。

“五·卅事件”是我在上海亲眼目击的。六、七月间返奉化，乃在故乡，同王仲偶、董子兴作演剧宣传。

这时(一九二五年)在奉化初中,已经有共产党员教员,如冯三昧、赵济猛、石愈白,但组织生活极不健全,党员中浪漫主义的气味甚浓。同时,“五·卅运动”被压下去后,各地反共势力增长,奉化初中胡颖之(行之)去日本留学,王仲偶被视为“赤化”头子,不能安顿下去、“~~剡~~社”内部乃决定以退为进,仲偶辞职不干,由我进去担任初中教务主任。冯三昧因为太红了,而且也因为与女高教员邬月秀闹恋爱关系,舆论不好,于是调了,请

宁波的赵济猛、石愈白来任教员，还请王以仁（作家）为国文教师。这时校内有共产党员三人，即赵、石和我，但不为其他人知道，以“剡社”为中心，也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与宁波相联系。但一切工作，仍以“剡社”名义进行。因为它是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有一批开明的和进步的绅士势力可依靠，其中主要工作之一，即为出版《新奉化》，由我主编。同时，我们那时已能读到党内刊物《共产主义ABC》（布哈林作），我们就在学生中宣传这些，并且每周设一时事课，讲解国内形势，鼓励学生进步和革命。

革命的形势日益高涨，严作书与王仲偶于一九二六年初，乃赴广州投奔革命。但王仲偶到广州后，看到附和蒋介石周围的都是“法治协会”派的人物，如俞飞鹏、朱守梅等，甚为不满。临行返奉，他竟自己写信忠告蒋介石，并要求蒋能设法送我去苏联学习。王仲偶回奉后，认为革命前途不可乐观，腐败分子钻进革命阵营太多。我乃在《新奉化》上写一篇社论，也有忠告蒋介石之意。

革命形势高潮的另一面，反“赤化”的镇压运动也在开始。警备司令（段承泽）禁止了《宁波评论》，并逮捕了国民党部工作人员蒋本菁（当时他也是共产党员）。在奉化，县长沈秉诚与城绅戴某、凌阿陶相勾结，以我在《新奉化》上批评他们，认为是犯了“公然侮辱”的法律，拟予逮捕。这就使我在那年六月间，同严竹书一起步行到宁波，因而未遭逮捕。到同年（一九二六年）九月，我因已接到蒋介石亲自写来的信，要我赴广州帮助他，（信是四、五月间收到的，因为广州发生了三月廿四日中山舰事变，考虑结果，不拟去广州。）到此，只好利用这封信的关

系去广州了。

（补记）一九二四年秋，上海曾派张秋人同志来宁波检查过党的组织。冬，恽代英同志也来宁波，住在四明日报馆。为推动那时党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有一批上海大学念书的宁波学生一同来，在明伦堂举行了演讲会，又发动了游行示威，我去广州时，因匆匆未带“转学证书”（即当时转组织关系的代名词），而且是否在广州住下，还未定。之后，我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时，找到张秋人同志证明，在政治部党组织正式过比较严格的政治生活。从一九二六年九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奉化与宁波的党组织活动都不太了解了。

那时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国民党力量，推进北伐运动（被称为国民革命），以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目的，但党同时也注意发展工人运动，在宁波以铁路工人和邮政工人为中心，商店小职员也被注意，人力车工人也开展组织，而党员的成分那时还是以中学教师、学生和小学教师为多。

二、大革命时期党的活动：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从广州回到宁波的，大约在二月间，武汉的国民党和在江西以蒋介石为首的，包括西山会议派的张静江等国民党发生建都的磨擦。武汉我党力量大，蒋介石不愿以武汉为北伐的首府，双方争执不已。蒋因此向李济琛（后方总司令部留守主任）示意消极“退休”，实为试探性质，故作姿态。李乃去电劝慰，并分发密电与其所属之第四军及其友军将领，实为“清共”的第一密谋。我从总司令部机要科（我代科长）得悉此事，乃密告周恩来同志。不久，北伐军从福建入浙，又自浙进

沪。我得组织同意，返沪转宁波。在宁波与当时地委同志卓兰芳、江少怀、赵济猛等相见，告以蒋、李反共浪潮将至，但卓、江、赵等正忙于打倒宁波防守司令王俊（黄埔学生、广东人），对我的意见未引起注意。同时陈独秀与汪精卫的联合宣言已发表，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政策，在宁波也有传达，大意认为：今后党的斗争着重于议会斗争，这是以国民党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业已完成为前提的。我在组织中也听到过这一传达。但人们革命情绪高涨，在宁波正忙于布置反王俊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我返奉化，参加奉化“县中”的党支部，并拟在奉化工作。四月十一日，宁波的国民党首先发动“清党”。国民党部常务委员杨眉山（中共党员）、工会主席王鲲（中共党员）和《民国日报》主笔庄禹梅，在参加王俊召开的会议时被扣押。接着国民党党部改组，各种工会都改作“大同盟”，其中骨干分子都是流氓，这很快影响奉化。当时奉化国民党部及政治活动方面，完全控制在我党手里。记得那时，奉化政治监察员是王仲偶（中共党员），国民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即书记）是庄公闾（即世楣），农工部是卓子英（中共党员），青年部长是董子兴（中共党员）。四、一二以后，浙江“清党”开始，改派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为政治监察委员，于是形势逆转。但奉化党组织还用各种策略，应付那个黄埔生，又以董子兴为人较灰色，决定要他们潜伏下来。其他如庄公闾、王仲偶等决定撤退，但不久奉化县长陆友章将庄、王逮捕，解送宁波。

我在奉化不久，接宁波方面函招，乃去宁波，表面上担任第四中学教员，实际上担任地委宣传部。这时宁波地委负责同志已调杭州，其中有赵济猛、于书稼。卓兰芳似已去沪，留下的只有

江少怀、王小曼和张明贤，王小曼不久又去台州（在那里被捕牺牲），江少怀（后脱党从商，闻后去台湾），张明贤（后脱党，据闻在上海与同乡做绑票的人在一起）和王任叔。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以警察厅长吴万能为首，勾结流氓，实行白色恐怖，各种人民团体，都被改作什么大同盟。地委同上海和浙江都不易取得联系，又缺乏工作和斗争经验，主要工作是两方面的：一是分化国民党内部，利用关系，联络警察厅政治部的吴某与吴万能的矛盾，企图将吴的势力打下去，记得江少怀曾被聘为顾问（秘书）；二是进行秘密宣传，散发传单等。那时，宁、汉分家，汪精卫尚未提出“分共”主张，郭沫若在武汉报上发表了《请看今日蒋介石》。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也从苏联来信，在武汉报上，登载广告，斥责其父蒋介石叛变革命。那时，地委即以国民党左派身份进行宣传，翻印上述二篇文章，动员青年学生到处散发，颇震动一时。

大约五、六月间，学校尚未放暑假，突然，杨虎、陈群又来宁波“清党”，这时王仲偶与庄长兆，已由庄崧甫保释出狱。王鯤、杨眉山、庄禹梅尚在狱中。此外又有镇海的胡蕉琴（女）、阿金（女），及四中青年学生（陈良年、吴德元）等。杨虎、陈群来宁波后第二天，即将杨眉山、王鯤两同志杀头示众。那时江少怀通知我即速离甬去沪，未成，第三天我也被捕。当即见胡蕉琴（女）和甘汉光两同志又被绑出去枪毙。第二天又将两个四中学生（陈良年、吴德元）绑出枪毙。而我之被捕，系杨虎、陈群收到俞飞鹏与朱守梅的电报，指为共产党人，但又别无证据。到第四天，那时尚是浙江省政府委员的庄崧甫赶到，亲自向杨、陈具保，杨、陈以庄为蒋介石老师，也卖了他的面子，我就被保释出

狱。

以后，我即不知道奉化和宁波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七年秋，我已在上海了，从此很少返回故乡。

编者按：王任叔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虽年逾古稀，仍被强迫回原籍奉化大堰村搓绳子，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和折磨，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含恨死去。我们发表王任叔同志这篇遗著，以示对这位老革命战士的深切悼念，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怒声讨。

宣中华同志战斗的一生

潘 念 之



宣中华烈士遗像

宣中华烈士原名锺华，“五·四”运动中激于爱国热情，改名中华。一八九八年生于浙江诸暨县牌头宣村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未能升学，在本乡任小学教师。旋获知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有一半膳费的津贴，乃于一九一六年秋考进设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夏毕业。

初 试 锋 芒

宣中华同志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正值国内政治动荡，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连年内战和卖国行为，极为愤慨，时常发表议论，与进步的教师和同学相激励。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更活跃地参加到运动中间去，成为第一师范学生会和杭州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杭州以工人和学生为核心的反对签订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巴黎和约，要求

撤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廿一条款等爱国运动，与上海的斗争相互呼应。中华同志不论在杭州，到上海，都站在斗争前列。宣中华同志又是当时文化斗争中激进的一员。他宣传打倒孔家店，破除旧礼教，反对读经学古文，提倡新思潮和白话文。他到处演说，散发传单，从校园搞到街头，轰动了整个社会。军阀、政客、地主、买办、反动士绅都惶惶不安，暴跳如雷，要求维持旧秩序，镇压所谓“共产公妻”、“非孔非孝”的洪水猛兽。他们向第一师范学校下手，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线学生、教员施行种种威胁、迫害，而以撤换该校的开明校长经子渊作为釜底抽薪的一着。于是“驱经”、“留经”成为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压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行动，在杭州教育界、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广泛斗争。宣中华同志在军警包围、断炊不眠的情况下，毅然领导着“留经”运动，团结全校师生，与以教育厅长夏敬观和体育学校校长王卓夫为代表的顽固派作不妥协的斗争。经过搏斗，一师师生得到全市广大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援助，暂时打退了反动派的围攻。

一九二一年，宣中华同志毕业于第一师范，历任一师附小教员和萧山东乡教育会总干事。这时他一面搞学校教育，一面参加社会斗争。在杭州，与原一师同学徐白民等创办《责任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要求改革社会制度。在萧山，不久前有过一次农民要求减租运动，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农民领袖李成虎被捕，死在狱中，其遗体安葬在东乡凤凰山上。宣联络当地小学教师，祭扫了李成虎之墓，调查这次运动的经过和失败原因，研究农民对地主阶级反抗斗争的重大意义，这期间宣中华同志曾到上海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干事，学习了马、恩和列宁的著作，并与

上海革命组织相往来，于是他的豪迈奔放的思想，归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

筹 建 党 团

一九二二年冬，他与原一师同学俞秀松，法政专校教师于树德、安存真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开展了工作。

一九二三年夏季，国际反帝同盟在莫斯科召开东方会议，宣中华同志被推为中国代表之一，赴苏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听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演讲，看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思想上深受启发，革命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时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获得组织上的批准，成为浙江党组织最早成员之一。对杭州党的建立及斗争，有不少贡献。

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决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斗争，指定一部分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其发展，提高其斗争力量。这时宣中华同志从苏联回国，根据党的决定加入国民党，在杭州筹建浙江国民党组织，先后被推为代表，出席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九二五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从此宣中华同志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国民党内进行活动，组织和领导左派力量与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浙江国民党组织一开始就有左、右两派的斗争。右派势力是地主买办的代表，以沈定一为首；左派势力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包括一部分非党进步分子，以宣中华同志为首。从一九二三年的浙江国民党筹备处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沈定一即以老国民党员自居，把持着组织。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

北京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结集，十一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中央会议，进行反对三大政策、驱逐共产党员、分裂国民党的策划。沈定一参加了西山会议派，企图以浙江的国民党组织响应西山会议。这时，宣中华同志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联系浙江国民党内的同志，进一步组织斗争，以阻遏反革命逆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国民党各县市组织的代表在宣中华同志主持下，集合在沪杭线的硖石镇东山公园开会，通过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通电，并否定沈定一把持的浙江省党部，成立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的职权。

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积极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底在杭州召开全省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浙江省党部，由少数共产党员和不同程度地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组成。宣中华同志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之一，主持着省党部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占领武汉、南昌、安庆等城市以后，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上海工人举行起义，汉口、九江的工人纠察队收回租界，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内部有了新的分化，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先后汇合，以蒋介石为中心而形成新右派。浙江的情况也如此，北伐军到达杭州以后，浙江革命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北洋军阀和沈定一右派，而是蒋介石新军阀、新右派了。

革 命 风 暴

二月十七日北伐军进入杭州，这些北伐军是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和由浙江军队周凤岐师改编的二十六军，都是十分反动的。当时由何应钦派充杭州公安局长的章烈，

更是他们的凶恶猎狗和打手，其后所有破坏革命活动和镇压革命人民的罪行，都是通过他的手来执行的。右派在党政方面的人是张静江（人杰）、马叙伦和收罗沈定一等人所凑合，他们内部虽有矛盾，但在“反共”的无耻口号下，暂时勾结起来了。（沈因与张争权，在后被张派人所暗杀。）

这时浙江尚无中共省委的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内成立了中共党组，宣中华同志担任书记。党组工作受江浙区委（设在上海）和杭州地委的双重领导，宣中华同志又是杭州地委成员之一。地委和党组密切相配合，使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成为有用的工具，有些工作得以通过它们来实施。

北伐军到达浙江，增加新军阀、新右派的势力，但他们还未将其反动面貌完全暴露以前，革命人民得到公开活动和合法斗争的机会，有迅速发展和组织起来的机会，对革命也有有利的一面。中共党组织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中间进行大量工作。杭州和宁波的总工会成立了，学联、妇联陆续组织起来，各县大多成立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国民党左派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斗争的口号是：减租减税，提高工农生活；反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省党部又创办《民国日报》（杭州、宁波两处），发行刊物，改组学校，举办革命工作人员的短训班，街头不断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革命风暴给社会旧势力以很大冲击。

右 派 反 扑

随着革命工作的发展，反动派的阴谋破坏也更紧张，盘据在

南昌蒋介石反动营垒内的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派了四个所谓特派员到浙江，力图分化拉拢各县市国民党人，以破坏左派的省党部，但他们收效甚少。原属沈定一派的杭州四府（金、衢、严、处）同乡会的大流氓杜震芎，收买打手，欺骗土木业行帮的少数人，于三月二十九日手持铁锤木棍，呼叫反动口号，在省政府和省党部前示威，扬言要捣毁省党部和总工会。宣中华同志刚强果敢，亲自临敌作战，指挥大部分工作人员集合在机关大门内，严阵以待。杭州总工会由工人群众进行保卫，由于我们戒备严密，反动派的大打出手，在杭州未能实现。

但从全局来说，形势愈来愈紧张了。在蒋介石直接统治下的长江下游各地，反革命破坏活动更加频繁，更加猖狂。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以后，蒋介石从南昌到了上海。三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头子张静江，突然到了杭州，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到省政府办公，也不接见省党部派去看他的人，而是住在西湖新新旅馆内同马叙伦、蒋梦麟等策划反共夺权。对此，杭州群众组织在当天傍晚举行游行，贴出“反对昏庸老朽分子（指张静江）、打倒西山会议派（指马叙伦）”的标语，予以抵制。次日，张静江、马叙伦等溜到上海去听取蒋介石的决策。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晨，杭州有细雨，宿雾未散，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反动派以杭州公安局局长章烈为指挥，在东路军杭州留守处的配合下，大批军警，分头向国民党省党部、杭州市党部、省政府、总工会、学联会、妇联会、国民日报等公开机关和个别人的住宅进发，进行包围、搜查，逮捕工作人员。宁波也在同一天发生反革命政变，其他县、市陆续遭到了镇压。浙江全省堕入白色恐怖中了。

张静江、马叙伦、周凤岐等匆匆赶来接收政权，实行反动统治。原来的西山会议派沈定一等右派分子虽在革命高潮中隐蔽一时，现在又出现了，与蒋介石反动派相勾结，组织所谓党务整理委员会，成为“清党”反共的头子，设立特种刑庭，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他们到处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

英 勇 就 义

宣中华同志在杭州活动多年，暴露在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四月十一日事变发生当时，他得到另一负责同志的通知，离开宿舍隐蔽起来。因其不可能再在杭州工作，经地委决定和布置，派员护送，第二天化装乘人力车至艮山门车站，改穿车长制服，坐上一次开往上海的军运列车的公事车。车到新龙华下车，正向租界行走时，后面来了两个国民党军人，他被挟持、架送到白崇禧的司令部内，据说他在艮山门上车时，已为敌方密探卢英认出，跟踪到沪，通知随车军人逮捕。（解放后卢英潜伏在上海，镇反中被查出镇压了。）

宣中华同志既被捕，被审问时，侃侃谈述革命的旨趣，并称参加革命之日即许身于党，死无所畏，大呼革命口号。这天午夜，在上海“四·一二”的紧密枪声中，宣中华同志被腰斩惨死于敌军司令部内，结束了他的战斗的一生，当时他年仅二十九岁。

浙江在“四·一一”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先后被杀害的同志除宣中华以外，在杭州有共产党员郑采丞、何赤华、姜天国，党外人士宣中禅（宣中华的弟弟）、王宇春；在宁波有共产党员王

琨、杨眉山、胡焦琴、甘汉光、陈良义；在金华和义乌有共产党员钱兆鹏、张新境；在嵊县有党外人士张本芝、华伦初等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革命受到了挫折，但革命是扑灭不了的。在“四·一一”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各地工作特委建立起来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城市工人罢工、农村秋收暴动掀起了更大的浪潮。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浙江的革命斗争和全国一样，逐步走上正确的路线，长时期的前仆后继，愈战愈勇，终于赢了解放。

一九七七年三月

张秋人烈士事略

陈 修 良

勤奋好学的少年时代

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张秋人同志诞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水霞张村一个自耕农的家庭里。乳名叫做友表，中学时改名为慕韩，又名慕寒。后来的笔名叫做秋人，是承袭他另一别号“丘人”而改音的。

家中有父母、叔伯、兄弟十余人，祖父和父亲都是种田人，每年收入仅够温饱。诸暨的文风向来很盛，有口饭吃的人家，都希望子弟念书，成长起来“耀祖荣宗”。



张秋人烈士遗像

因而张秋人同志不满八岁，家里人就送他入了家乡“同文”小学上学。他读完了初小二年级，由于天资聪敏，品学优良，跳级进入高小。一九一四年在同文小学毕业，名列第一。诸

暨有娶童养媳的恶习，幼年时，家人为张秋人同志找了一个童养媳（即钱汉英同志）。这件事使他很不满意，对封建风俗开始厌恶。